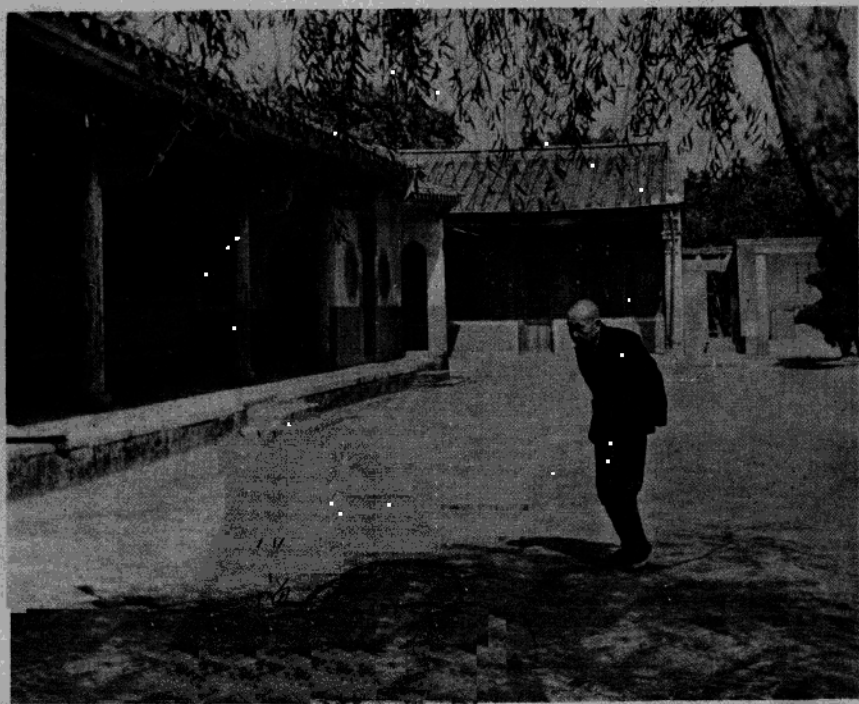




臺南文化

第六卷 第一期



（頁七五第期本見明說）作生先津安楊 景冬寺元開 齋冬園北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

石蘭山館遺稿存真 (一)

育嬰堂吟 亦呈詞

為溺女心殘食呈慈禁育嬰費浩請示勸捐事竊聞
行道有福大德曰生生女而願有家必得其子父
不字厥子是誠何心嗟彼賊恩罔知最法賒去故
育資官長之施仁教樂補偏亦賴士夫之尚義職員
石時祭本其樂善之念倡為育嬰之堂仿象郡以立
規相觀而善行臺邑之創舉有開必先然而山不讓
塵方基覆育水則清潤允待法江欲籌經久之實必
藉衆學之力是茲中議亟行餘呈荷收養之有方詎
和哉而無罪嚴故敬子孫之律報暴永祛隆任邯鄲

棠之義鳴實易集井亭以生靈所繫德政攸關願
保赤之誠履過垂青之鑒伏祈老父臺大人誠頌甲
令徽切子孳渡苦海以慈航禁溺而法森三尺威愜
囊以慧劍勸捐而利溥一言擬因告諭之從風另列
規條而呈電切叩

袁建育嬰堂啟

吳興山冷香綢然因女之魂脣銜海昏黑浪埋沉娥
之魄乃生女孑孓原叶於冠蛇雖彼惡人心竟殘於
針虎非赤毛而棄諸瓊下致金鉤之損於裾中此非
律為難事難留所恩之女不遇手卿當戶時卹深傷

附 林夢石蘭山館遺稿校記

(一)

藏名不匿情誠恐為是差付物信然耳

尤中一吐惡言以性忌為為村此言誠實，吾城對縣
以冠引念慈，首字能別雖字法第不村示為至也

(二)

空卷二字見漢書似宜注原底為是王夢林夢石
臨古不命申見機便不費去故字林夢石夢石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創刊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臺南文化 第六卷 第一期 目錄

北園多齋

楊文津稿(封面)

石蘭山館遺稿存真

(封裏)

鄭成功夫人與開元寺

黃典權(二)

黃道周傳(上)

葉英(一六)

臺灣研究兩篇(上)

林逸人譯(一七)

臺灣府志與早期志料

毛一波(一八)

日據末年臺南糧荒的文獻

曾迺碩(一九)

臺南市民間說書藝人

許丙丁(二〇)

臺灣雜事詩

趙阿南(二一)

清代臺灣歌謠(上)

賴建銘(二二)

西來庵事件(上)

韓石麟(二三)

蔡牽朱潰海盜之研究

黃典權(二四)

族譜研究編號之擬議

黃典權(二五)

採訪記

編纂組(二六)

臺灣石蘭山館遺稿

施瓊芳遺稿
黃典權點校(二七)

石蘭山館遺稿存真

(封底裏)

編者的話

(封底)

努力整理鄉土文獻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鄭成功夫人與開元寺

黃典權

前言

鄭成功元配董夫人，曾因丈夫的豐功偉績而成為臺灣婦孺皆曉的人物。可是也許因為我國傳統忽視女性，前代史家述夫人的事蹟，類多寥寥數語，非常概略。筆者在最近四年中，整理鄭成功史料多種，尋繹比較，發現一些非常史事，認識她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女中豪傑。乃鈎索史誌，弔勘遺蹟，爰草此文，藉存懿範。

鄭成功夫人的生平

董夫人在明天啓三年（即「癸亥九月二十四日」）〔鄭克臚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生在一個高貴的家庭裏。她是泉州進士禮部侍郎董國先的胞姪女。自幼被教養得「方正端雅」，「勤儉恭謹」，以賢德見稱。這種德性便是她後日佐助鄭成功偉大事業的堅實基礎。她至遲在崇禎十五年孟春便已嫁給鄭成功。（她長成功一歲）

當成功賜姓封伯，帶兵鎮守仙霞關（隆武二年八月）時，她隨行軍中，這可從夏琳的「海紀輯要」看出來。「輯要」卷之一云：

「〔隆武二年秋八月〕（鄭）芝龍聞清師將至，密遣親吏……授意於成功，令引兵還。親吏……至仙霞入見成功。……成功曰：『歸語太師（指鄭芝龍），速發餉濟師！吾妻妾簪珥皆脫以供軍需。』因引入臥內，見夫人等皆布裙竹屨。」據此可以看出：董夫人為着軍需孔亟，幾乎犧牲一切，儉約得有如村姑。她可說是「成功治內之道」的執行者，把一個家庭的內部管理得符合戰時體制的需要。故郁永河「鄭氏逸事」乃說她「日率姬妾婢婦為紡績及製甲冑諸物佐勞軍」。

鄭成功的家庭是够龐大的，夷考「鄭氏石井本宗族譜」，成功除董夫人外，尚有八個姬妾，這在一般人家，勾心鬭角

，爭寵妬忌，怕是難免的事；但是董夫人却以賢德見稱，使得鄭藩內眷平靜無波。董夫人如是治家，自然令成功十分敬重；而她在一次危急關頭的大義表現，更使得成功敬上加敬而引爲事業的知己。初永曆四年（1649）的十月成功經略粵東，夫人與世子監守中左，他族叔芝莞「管理中左地方事」，負責防守事宜。第二年春間，成功奉旨南下勤王，清福建巡撫張學聖命泉鎮馬得功乘虛偷襲廈門（時稱中左所），守將阮引、何德不敵，芝莞亦遁，這時董夫人應變的非常舉動，乃造成她個人歷史的巔峯。「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云：

「永曆五年三月十四日，虜（清）過中左，……太夫人向世藩（鄭經）棄其輜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之三（海東山房本九三頁）述之尤詳：

「島中鼎沸，成功妻董氏懷神主出（同書卷之九作「獨懷鄭門神主出奔」）步行海濱，見船仔招之曰：『我董夫人也！』舵工林禮泊岸，背夫人落船。夫人曰：『那隻船是莞爺的？』禮指以重載者是。夫人令泊其船。芝莞見夫人，忙請曰：『此戰艦也，不便居。請夫人到家眷船中，有人伏伺。』夫人知此船係芝莞積藏，識破機關，乃曰：『媳婦喜乘此船，今戰征（爭）時候，非此不可。』莞再三相強，夫人坐而不動。」

這充分表現董夫人的「識大義，有膽量」。不過上引兩例有一點是需加辨證的，那便是夫人所背帶的究屬何人的神主？據從征實錄所說是「祖宗的神主」，好像神主不只一件。「臺灣外記」則僅說「懷神主出」，所指尤爲籠統。考夏琳「海紀輯要」卷之三云：

「辛卯（按即永曆五年），馬得功入島，妃（指董夫人）獨懷其姑木主以行，賜姓嘉其識大義。」（「海紀輯要」別本「閩海紀要」下卷同）

鄭亦鄭「鄭成功傳」卷下亦云：

「辛卯之難，董踰險逃出，獨懷其姑木主以免。」

俱明確指出董夫人所懷出逃的鄭門木主係屬「其姑」，即成功生母翁夫人。在這裏我們審情度理，頗認其確。因爲成功生性篤孝，時思亡母，特別重視母親的神主，自屬當然之事；我們翻讀「從征實錄」第九葉，知永曆四年八月，成功在廈門

「設壇請兵部萬年英宣勅行禮祭(翁)太夫人」，這已是母親死後的好幾年，成功尚且有此儀節，足證其平素，必時加叩拜；董夫人隨夫盡禮，久已知此象徵母愛的婆婆神主對丈夫是多麼重要，故在惴惴逃難之際乃不敢忘懷而携之以出。

董夫人既把懷祖的倫理高度發揮，而使懦將的貪賍無法遁隱，(事後芝莞以失機論斬)於是成功在閨房之中乃發現了得力的同志，從此對她更加敬重，使她「並預兵旅事」。(「臺灣外記」卷之九)

董夫人所預之「兵旅事」，我們從各種史料暫難有所勾稽，祇有她對後勤工作的貢獻卻還清楚：如她曾為成功動員了全體女眷從事於生產與軍需的工作(請參閱前引「鄭氏逸事」)，由於她的殷勤禮遇更把全體文武眷屬聯成了一條心。「從征實錄」八七葉有一段重要資料說：

「(永曆十一年六月)派出出征居守水陸官兵并船隻，入宴賞在州各文武官并將領。令國母(董夫人)分作七程，敦請出征居守文武將領各(父)母妻子女入府宴待，并招次賜資金帛有差：一程，請提督并六官父母妻子；次，統領；次，總鎮；次，署鎮；次，管理；次，營將；次，死難勳功等。繇是，將士歡騰，感激益奮。」

在反清復明的偉大鬥爭中，後方有時比前方更重要，文武眷屬的安頓，陣亡忠臣遺孤的撫恤，對民心士氣，都有莫大的影響。這絕不僅是嚴峻的法令所能維繫，而需要那慈母般的照顧，長者似的慰安，董夫人在這方面可說發揮過充分的天才。

再則成功軍紀嚴肅，也有她所施的影響力，鄭亦都「鄭成功傳」說「凡海上(指成功軍)所至，禁姦止殺，董亦有力焉。」可為明證。

根據史料的暗示，永曆十二、三年間鄭成功北伐金陵時，董夫人也應隨軍進發。因為所有將領女眷全部隨征(見「從征實錄」一〇九等葉)成功本人的妾媵兒子也多隨行，「從征實錄」一〇三葉記成功羊山遇風沒失家屬云：

「船中失去六妃嬪并二、三舍、五舍三位。」

「臺灣外記」亦云：

「功失四子書、七子浴(裕)、八子溫……」

雖然二者所記成功諸子之溺亡多不確，但由所記，可知成功諸子實嘗隨征。「延平二王集」有鄭經「痛孝陵淪陷詩」云：

「故國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雲自來去，遙望更傷心！」

（按十二年秋七月，成功「遙祭太祖高皇帝孝陵」，「見海紀輯要卷之一」），故經此詩有遙望諸句）

也可作一旁證。諸子膝妾及將士女眷既隨征，董夫人，要號召羣心，管理姬妾，自然不能獨留思明（廈門）。

南京敗歸，第二年達素李率泰大舉進犯思明，「家眷搬住金門」（「從征實錄」一三七葉），董夫人大概有半年多的時間逗留在那裏。

永曆十五年三月成功進平臺灣。董夫人與世子鄭經監守二島。從此他與成功生離而竟也死別。以後她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金廈二島的決策行事，都要經她首肯。

也許因為她所負的責任太重，以致無法專注兒子們的教育，使得他們沒有一個是飛揚挺拔的端肅人物。（請參閱拙著「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之「自序」及「延平王內府人物表」）就像鄭經還算是能够勉維局面的人物，就已經有私通乳媼生子的亂行。這件事使得成功憤怒到極點，董夫人差點兒斷送了性命。會成功遽逝，才不了了之。

到了鄭經嗣襲以後，董夫人的地位便更加重要起來，從此她是反清復明陣營中的「國太」，鄭氏藩府內外的總顧問，有她，平庸的鄭經還能振作有為。永曆十八年，她自金廈退守臺灣，即長期居於安平鎮之王城。此後陳永華的創業造產，鄭克塽的英偉監國，多少有她隱護支持的幫助。及後年事漸高，善念愈長，更時常「深戒子孫，當撫恤百姓，厚待將士」。可以說這慈風之廣被，使得新開的東寧，洋溢着一片安定溫暖的氣象。

在她晚年，鄭經的西征無功，曾引起她非常的憤怒，當面責備經說：「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耳！」從這字裏行間，可看出董夫人對任人處事俱具眼光。鄭經在嗣藩的過程中，受她從旁督導，總能維持局面於不墜；一到西征，遠離「慈暉」，便鬧得烏煙瘴氣。在這裏，更可意會出董夫人的決非尋常了。鄭經死後，東寧政局由於鄭克塽之被弑，而慘變非常。這件事是董夫人垂暮之年的沈哀極痛，也是她的致死之由，其

演變過程又跟她發生莫大的關係。

原來在鄭經西征敗歸後，東寧的統治高層上已在發生可怕的惡化：當初陳永華身任東寧總制使，統理勇衛軍，兼任諸議參軍監軍御史，長期綜理軍政，極得人心。他選用了不少正派而且能幹的人物。後來他們輔佐監國鄭克塽，使他深得「兵民感戴，權勢屏息」。鄭克塽陳永華這一派的人，可說是東寧政局中的主流。可惜鄭經諸弟都屬庸碌之輩，而恃勢橫行。鄭克塽「不肯阿容徇縱」，遂引起他們深加痛恨，罵塽「狂悖剛強」。因此他們成為反對鄭克塽的第一股逆流，難免在伺機觀變。另外在鄭經周圍的馮錫范、李景、張日曜輩，正是董夫人所指的「左右竊權」之人。尤其是馮錫范，更是被人一致指罵的西征失敗罪魁。錫范自己也知道「思明之棄，衆咸歸咎于己」。可是自己並不反省，只一味邪圖「非握重兵，不足以壓衆」。非去陳永華，無法攪大權。他就「詭謂永華曰：『自愧護駕西征無效，擬欲辭職。』永華私念曰：『彼武夫也，尙能謙退；吾儕文士，豈可久戀重權？』即具啓乞解兵柄，并辭總制。」（見「海紀輯要」卷三，「閩海紀要」卷下）奸計既售，錫范密贊鄭經許之，「以其軍歸劉國軒，而已仍任侍衛。」（全上引）勇衛軍是東寧「最驍壯」的部伍，現在歸劉國軒所統，無異爲錫范添長羽翼。劉國軒本非奸邪之流，但他受過錫范父親澄世之賞識栽培，激感重恩而拜爲義父，這使得馮錫范跟他發生了一層極密切的私人關係。錫范就利用這一點，使國軒在他跟陳永華之間立起來而無法對他不利。至是馮錫范在東寧政局中已完成謀變篡奪的基礎。這是反對鄭克塽的第二股遂流。

待鄭經一死，馮錫范、李景、張日曜輩馬上圖謀政變。馮錫范先說服劉國軒明裝袖手，暗裏幫忙；再陰結鄭經諸弟聰、明、智、柔諸公子，叫他們在董夫人面前攻擊克塽，說他是「乳母所生，姦生之子，非正嫡之子，（阮曼錫海上見聞錄卷二）故外面鎮弁將士以及百姓，各紛紛鼎沸。（臺灣外記）」原來鄭克塽爲乳母所生早就是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說因此惹起軍民的反對，顯係妄言，所以董夫人馬上就駁斥說：「監國（克塽）秉政兩載，兵民素所悅服，焉有是事？」但是，劉國軒避不出面，馮錫范在董夫人面前極度造謠虛張，鄭聰鄭明等這批糊塗蟲又把政局的動盪誇說成萬分危殆，於是在垂暮的年光，董夫人遂暴露了女性易於優柔的弱點，「主意不定，虞其有變，即允易位。」（臺灣外記）可是董夫人並沒有傷害克塽的意思，她命令柯鼎開往傳克塽進內庭議事，無非想把大勢所趨的情況告訴他，命他交出「監國印」，讓退嗣

襲的權利而已。那知她未見克嚙一面，馮錫范已命部下蔡添把他血刃弑害。克嚙既死，嗣襲王位的權利自然落到鄭經次子同時就是馮錫范女婿鄭克塽的頭上。這樣馮錫范完全勝利了，可憐董夫人卻傷心到了極點，我們請看舊史的紀錄：阮曼錫「海上見聞錄」卷二云：

「（永曆三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董太妃率世子克塽襲位，時年十二，錫範（范）之婿。百官朝賀畢，太妃起，出位，諭以誅監國故，以世子付託馮、劉等（輔）佐，竭力匡扶，『涕淚沾襟』。」

夏琳「閩海紀畧」（非「閩海紀要」）卷下云：

「（永曆三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董太妃率世子克塽登位，百官朝賀畢，太妃起出位，復諭□以誅監國（故）。以世子付託馮、劉等曰：『悉力匡扶！』涕泗沾襟。」

讀上引文，我們可知董夫人宣佈殺害監國的原因，以及叫馮劉等「悉力匡扶」是出於多麼無奈的情懷；而她沾濕衣襟的成串淚珠，無疑是難盡形容的傷痛了！後來監國夫人陳氏的自經殉節，國太更加深受刺激而悲傷於懷。

鄭經死後這一連串悲劇的結果形成馮錫范獨裁的政局。董夫人飽歷憂患，那會不知權臣專橫局勢之險惡，所以就藉次子聽去輔政以挽回局面，「海紀輯要」卷三（「閩海紀要」卷下同）有云：

「聽，賜姓次子，世子初立，以太妃命，封爲輔政公。」

「然聽庸懦，事少決斷，惟馮錫范是聽。」（同上引）這不但一點也不能挽救藩府大權旁落的危機，反而爲馮錫范增多一具擺弄的傀儡。稍後三四公子鄭明鄭智捐資募兵，想培養藩府的羽翼；可是他們執犄成習，「一旅未成，騷擾難堪」，又叫馮錫范劉國軒找藉口給阻止了。眼見一切努力盡歸泡影，局面絲毫沒有挽回的希望，愈痛念「監國死非其罪，且非己意。」（臺灣外記）積鬱於懷，生起病來，在這一年六月的十六日，董夫人便死在安平的王城裏，享年五十九歲。

鄭成功夫人與開元寺

上面把董夫人的生平作一番介紹，我們大體當可瞭解她是一位德行與能力備全的難得女性，始則全力相夫，繼而督訓

世子，俱見其一生積極，沒有一般婦女老而閒退之優遊養息的生涯。但是余文儀「續修臺灣府誌」卷十九「雜記」之「園亭」所記，到顯露她在臺灣有過優遊的隱退生活，其「北園別館」條有云：

「北園別館，在邑治北五里許，僞鄭爲母董氏建。」

薛志亮「續修臺灣縣誌」卷五「外編」之「遺蹟」亦云：

「北園別館，在永康里，僞鄭爲其母董氏建。後廢。」

鄭明白說出鄭經會爲他母親董夫人在與安平隔海頗遠的地方建了一個「別館」，那當然是給她老人家作退閒遊樂的地方。這是一向令人深信不疑的故實。筆者本人在未深研鄭氏歷史的數年以前，亦何嘗不是這樣。待我在民國四十三年冬天詳細點校江日昇的「臺灣外記」時，始對上引資料發生懷疑，因爲我從「外記」裏面發現董夫人在臺灣的時間似乎都長住在安平的王城裏，尤其是在她活世最後兩年，她更明確地有住在「安平」的紀錄。「外記」卷之九開始即說：

「康熙二十年辛酉，附稱永曆三十五年（年）正月元旦，克塽率文武朝賀（永曆帝）於臺灣之「安平鎮」，然後拜賀董國太，方過承天府洲仔尾朝（鄭）經」。

在這裏面，我們很明白地可以看出鄭克塽「拜賀董國太」後要朝拜鄭經需過承天府；那麼董夫人在她一生最後一年（永曆三十五年）的元旦確是住在不屬於承天府的這一邊。從「外記」敘述的順序看來，他住的地方是安平自是不需分析的事，所以她那時不會住在「北園別館」。

在「外記」卷之九的別處又有載云：

「國太隨遣人傳錫范、國軒議事。軒以病辭，不赴；差中軍金榮到「安平鎮」啓國太曰……」

也明白說董夫人確住在安平鎮。雖然持反對看法的人會說，那是鄭經甫逝、局勢大變之時，她假定前已退隱，此時自然也要返回王城坐鎮的。但我認爲這條資料有前引一條相配稱，董夫人久居安平鎮的確實性顯然增強不少。由這兩條資料而對董夫人隱退「北園別館」一事生疑追問，至少是重要的線索。於是打破沙鍋問到底的企望，自然對他書之「北園別館」紀事力加查究了。

我查究的第一部書是高拱乾的「臺灣府志」，是志卷之九「外志」之「寺觀」云：

「海會寺，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許，舊爲鄭氏別館。蕩平之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因其故址建爲寺宇，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碑記載藝文志。」

這僅泛言「別館」是「鄭氏」之物，一點看不出它跟董夫人有何特殊關係。引文中嘗言「碑記載藝文志」，究竟「高志」藝文志裏並無有關海會寺的碑記。到是續修臺灣縣誌卷之七「藝文」裏有王化行的「始建海會寺記」，此記對「北園別館」的荒涼情貌有一段值得重視的文獻，那是說：

「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

照樣看不出它跟董夫人的關係。此外如康熙五十九年陳文達纂修之「臺灣縣誌」卷九「雜記」所載：

「海會寺，鄭氏舊宅也，距邑治四里許，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爲寺，佛像莊嚴，寺宇寬敞，亦名開元寺。」

黃叔瓚（六十二年巡臺灣）「臺海使槎錄」卷三「赤嵌筆談」之「泉井園石」所談：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臺曲折凌峻之致。丙寅，臺廈道周昌，因其地，仍其茂林修竹，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題曰『致微』，有『秋夜遊北園記』。」

給人的印象也都一樣。其他對於「北園別館」或「開元寺」一定會有記載的周元文修之「臺灣府志」、尹士傑所撰之「臺灣志畧」、劉良璧纂修之「臺灣府志」、范咸纂修之「臺灣府志」、魯鼎梅重修之「臺灣縣志」諸書，在臺南可惜沒有查檢的機會，其中也許備載若干重要的資料；不過前述除「周志」外，俱屬雍乾以後的作品，想多抄襲舊志，縱有所材，怕也不會超過續修臺灣府縣誌相類的記載，所以對「董夫人與北園別館之是否發生特殊關係」這問題所能供給的資料諒不至有獨特的發現。大抵我們敢斷言：早期的臺灣方志並沒有續修臺灣府縣二志關於「北園別館」「係僞鄭爲母董氏建」這樣的說法，於是，我由「臺灣外記」所起對「董夫人隱退北園別館」之疑竇，至是愈益加重了。

「北園別館」之「鄭經爲其母董氏建」這一說法既然可疑，那麼它建造的動機當別有在，從林謙光的「臺灣紀畧」與

「臺灣外記」二書的尋繹，使我覺得「北園別館」十分可能是鄭經建以自享縱樂的亭園。「臺灣紀略」有云：

「經退閒於洲仔尾，築遊觀之地，峽宇雕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

「臺灣外記」卷之八亦云：

「（永曆三十四年十月）經以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等相繼淪亡，不勝感嘆。遂於洲仔尾擇地，令李景監造園亭，植種花木。一日……經同克暨、錫范……等文士武將圍射酣樂，繼夜而散。經就洲仔尾園亭爲居，移諸嬖倖於內，縱情花酒。」

我憑什麼理由把「洲仔尾園亭」的「遊觀之地」與「北園別館」聯在一起呢？因爲

①「北園別館」與「洲仔尾園亭」的地望同在赤嵌（即後之臺灣府城）之北。

②「北園別館」的最大特色在「茂林修竹」；「洲仔尾園亭」亦以「茂林嘉卉」勝。

③「洲仔尾園亭」既是極島中華麗的峽宇雕牆，而「北園別館」却是「宏敞幽寂」的一所「廢舍」，狀有盛衰，神離而貌實相合。

這樣的說法我雖自感順理成章，但一與朋友們討論，他們對「北園別館與董夫人之關係可疑」一點頗表同意，而以「北園別館」即鄭經的「洲仔尾園亭」一點却不敢苟同，他們的理由是：

①「洲仔尾園亭」與「北園別館」的地望雖同在赤嵌之北，可是洲仔尾屬武定里，而開元寺却屬永康里，這不容混淆。

②黃叔職的「臺灣輿圖」，洲仔尾地名與海會寺都有明白的標題，二者且有水相隔，顯非一處。

③今日洲仔尾（屬臺南縣永康鄉）的住民向傳說着那裏有個地方叫做「花園」，當即鄭經「洲仔尾園亭」的遺址。

關於上述三點，我會很冷靜地加以探討，並實親勘故蹟。我請教過石暘睢先生，問他開元寺（即北園別館遺址）與洲仔尾的地望問題，他竟不假思索就說，在他少年時，嘗聞故老傳言：「臺南府城小北門以外（北）的地方，一般已指爲洲仔尾了。」根據這個說法，「北園別館」之在洲仔尾是沒有問題的。至於上述①②之以里屬相異與圖標有別證二者殊方一節，我認爲理由並不充分。因爲洲仔尾並非政治區域的單位，她是一個因地形產生的寬泛地名，其所指極難確定。那好像鄭

氏時代的「赤嵌」（由於族居而得名）「鯤鯓」（由於地形而得名），俱非政治區域，你是無法用線條去範圍說明的。這類地名，由於政治組織的進步，地方經濟之繁榮，或被採作區劃的地名，或仍沿舊為民間的俗稱，往往不是擴大便是縮小，而去古甚遠，故據後代之區劃（雖然武定、永康二里鄭氏時似已存在，但其所指是否與清代相同殊不敢必）和變色的地圖以論前朝地理，不加鑑別，據直以斷，殊難服人。何況古代製圖，沒有一定的成法，地名的標示很少能够確切包括應有的範圍。至於③所謂洲仔尾「花園」，更不能武斷地指定即屬鄭經的「洲仔尾園亭」之遺址，根據志書的資料、史家的筆記，結果完全是否定的。「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之「園亭」云：

「陳氏園，在武定里，偽（鄭氏）時陳永華別墅，今廢。」

連雅堂先生的「臺南古跡志」就更明白地說：

「陳氏園在北門外武定里，東都總制陳永華建，俗稱『華（花）園』，大約二百畝。後歸吳氏。吳氏質諸吾家。少時曾侍先府君往遊。臺館久亡，唯餘敗瓦，耕夫牧豎，往來其中，早已不知故蹟；然總制功德在人，至今念之，復何傷（夫）禾黍？」

前年秋間筆者就曾偕友人親往踏勘，在今日永康鄉鹽行公路邊探詢過土人，據云，那公路東邊的一片廣漠的蔗園，即係一般所指的「花園」。那跟「古跡志」所述者，若合符節。總之友人對我所提的三點反駁，竟不足以動搖我的看法。

可是就考證的方法說來，在上述的冗長探索過程中，我對自己的「推翻傳統的北園別館與董夫人關係」的「舊觀」以及「建立洲仔尾園亭即所謂北園別館」的「新見」（恕我妄用此名）一節仍深有缺乏證據的憾意；因為我據以推翻「舊觀」的資料，僅是消極的「言不相涉」或「偶然事件」，若非有積極性的資料得自本質上足以闡明「北園別館」風貌之與董夫人的身份背馳，我的推翻理論怕也只能在假定的情況中永遠徘徊而已。就是在建立「新見」的論據上，我也同樣地缺乏積極性的證明，我無從得到「北園別館」之有如「臺灣外記」對「洲仔尾園亭」所描寫的花酒情態。於是我就更加努力地在地故紙堆中猛鑽下去，但是失望的很，很長的時間我竟毫無所得。後來有一天偶然翻到高拱乾「臺灣府志」等書的藝文，從那些弔詭「海會寺」的詩篇中竟得到我那「推陳出新」所需的積極性史料。這給我以「踏穿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功夫

」似的非常喜悅，茲編號錄之於後：

A 齊體物「海會寺」(高志卷十，余志卷二十六題作「北園別館即海會寺」)

冷月橫斜弔子規，當年黃帽爾徒爲！梁塵尚逐梵音起，幡影猶疑舞袖垂。風雨有時聞響屐，草花何用長胭脂？是空是色渾閒事，只合登臨不合悲。

B 婁廣「海會寺」(余志卷二十五)

此地當年擬館娃，層樓海市翫圖除。王孫已去遺芳草！宮院誰來掃落花？歌管聲沉聞貝葉，舞衫采徹現袈裟。我非竹院空閒過，喜見梯航屬一家。

C 張涇「海會寺」(余志卷十九)

歌韻蠻姬易梵腔，層樓烟際晚鐘撞，吟詩賭笑人稀到，寒煞孤寒白菊牕。

D 陳輝「春日遊海會寺」(余志卷二十五、薛志卷之八)

翠竹斜榕小徑通，招提舊日館娃宮。曇花冷對粧樓月，貝葉寒生舞殿風。野色蒼茫留院落，溪烟黯淡到簾櫳。尋春莫問權娛事，翫業興亡總是空！

E 盧九圍「海會寺」(余志卷二十五、薛志卷八)

月戶雲扉半草萊，猶誇當日起樓臺。寒枝莫辨金環處，貝葉誰留玉帶來。織水真機魚活潑，曇花幻夢蝶徘徊。高僧自證無生訣，懶向他年論劫灰。

F 鍾琦「海會寺」(余志卷二十六、薛志卷八)

草莽英雄地，樓臺歌舞春。荒烟迷斷礎，淨業饑前因。潮長龍歸鉢，亭空鳥喚人。自今依慧日，無復海揚塵。

判斷史料價值之高下，作者與史蹟之時地關係是先需研明的工作，所以我們在證史之前勢必先把上引六詩之作者作一番簡要的介紹：

「A」詩作者齊體物「正黃旗人，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進士。康熙三十年1691任（臺灣府同知），稽查商船，

津梁無阻，賈人便之。凡有讞決，多所平反。」（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三「秩官」）

「B」詩作者婁廣「京衛人，武進士。康熙四十四年 1705 任（鎮標右營守備）。」（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卷之四「軍忠」）

「C」詩作者張湄「浙江錢塘人，癸丑（雍正十一年 1733）進士，乾隆六年 1741 四月十二日到任（巡臺御史），八年四月十二日差滿。」（拙編「臺南市志稿人物志」卷上「清代人物表表伍」）

「D」詩作者陳輝「字旭初，號明之，臺邑人，乾隆戊午（三年）舉人。素嫻吟咏，巡道劉良璧重修府志（六年成）聘任分輯。」（拙編「臺南市志稿人物志」卷下「列傳」「舉行」篇）

「E」詩作者盧九圍，生平未詳，唯據薛志亮「續修臺灣縣誌」卷末「重修縣誌姓氏」之「編纂」作「生員盧九圍」，名列陳輝後，是九圍亦乾隆初人。而按同書後跋魯鼎梅原序，知其號曰「幼達」。

「F」詩作者錢琦「字相人，浙江錢塘人，乾隆丁巳（十一年 1746）進士。十六年 1751，以御史巡視臺灣。」（拙編「臺南市志稿人物志」引「光緒臺灣通志」）

我們知道「時地相近」的史料，其價值必高。上述作者，以地緣論，不是臺灣縣的文士，便是親履斯土的文武官，他們的明瞭臺灣風土歷史自不待言。至以時代論，則齊體物康熙三十年任臺灣府同知，距鄭氏之亡不過八年，時代最近。婁廣任守備後體物十四年，距鄭氏之亡也才二十二年，時代仍然很近，所以他們兩人對鄭氏的歷史與故蹟，一定見聞詳確，記憶猶新。其「A」「B」二詩無疑是「北園別館」最具價值的史料。其餘四人時代稍後，所賦諸篇之史料價值仍是頗高，然而視前要稍遜一嚮了。

上引吟咏「海會寺」的七首詩無疑俱深涵蘊用「北園別館」的懷古情味。我們很容易從它們「懷古」的句子裏看出作者對「北園」的印象竟是王者春夢也似的宮景，其作者時代愈與相近則這種情調愈濃；否則愈淡。請看「A」詩的「子規」、「黃輻」、「梁塵」、「響屢」，「B」詩的「館娃」、「霸圖」、「王孫」、「宮院」，够清楚的，齊體物與婁廣都認明這個故蹟是一個導致國亡的好色昏王的離宮（吳王夫差與蜀主杜宇俱好色而亡國）。此外「D」詩尚有同調，「F」

詩也有「草莽英雄」「樓臺歌舞」之句，「C」「E」則幾不着痕跡了。憑用了這座「昏王」的「離宮」，詩人們乃運用夢幻也似的筆調把它的情景給描寫出來：從梵音聲裏，恍似聽見震動「梁塵」的歌唱；從佛子「幡影」中，彷彿看到垂拂多姿的「舞袖」。「風雨」的天籟有如美人的步履（響屧），「花草」的顏色也難免引起艷麗的聯想（胭脂）。（以上見A詩）但是：當年美麗的離宮（館娃），終於冷落了（霸圖除）。「王孫」投降去了，留下的只是令人馳思的「芳草」，但見零殘可憐的「落花」而已。熱情的歌聲消逝了，只聽見陣陣單調的清韻；燦爛的舞影下場了，呈現出的是沉味全非的色相。（以上見B詩）

這些詩篇無疑的把「北園別館」的歌舞風貌表露無遺，以與董夫人「方正端雅、勤儉恭謹」的懿範相較，顯屬天淵之別，不啻冰炭之不能相容，故「北園別館」之非「鄭經為其母董氏建」這一辨正至此已經完全可以確定了。再說上揭「別館」的歌舞描寫，更可為「外記」所云鄭經在「洲仔尾園亭」中「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而竟卜畫卜夜之歌」（「外記」卷八）那段記事之細膩注解。「北園別館」這所「離宮」無疑即是「洲仔尾園亭」；不然在鄭氏開府臺灣後的二十餘年間，延平內府中，除了「世藩」鄭經外，尚有那一個人物當得起「夫差」「杜宇」以及「草莽英雄」諸詞的影射呢？

餘 論

由於「北園別館」史實的闡明，我們尚可進而討論若干問題：

一、由於「北園別館」之非為董夫人所建，我們可知她的一生沒有隱退的歷史，其才德兼備、一向積極的生平更可確定。至於她跟「別館」的關係：根據「臺灣外記」，鄭經在「洲仔尾園亭」死後，「克塽……令人飛報董國太。國太遂率諸子……等咸至。」這是她親臨「別館」的唯一記錄。我們在首節已知董夫人在鄭氏藩府的崇高地位，鄭經對這樣莊嚴的母親是敬畏的。因而他要構築縱樂的遊館，自然要選定在那遙遠的北郊，庶免驚動母親，引來經常的責備。鄭經死後，董夫人悼亡之餘一定對這座園亭大起惡感，對那些害人的「尤物」自必痛加責備。據我猜想，「別館」的美人羣中有幾個即因受責而自殺。夏琳「閩海紀略」卷下所云之（永曆卅五年）三月……十一日，先藩（鄭經）所愛四嬪同日俱投繯從死。